

疾奔的中国要学会放慢脚步

本报评论员

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11.2%,这是中国“十一五”交出的靓丽成绩单。考虑到其中有两年是在金融海啸及其余波中渡过,我们更有理由为这个成绩感到欣慰。

如果将时间的维度往前推至1978年,从那时算起,30多年来中国GDP年均增速约为10%,这同样是一个让世界惊叹的成绩。这个成绩,或者说奇迹,可以命名为“中国速度”;与之相对应的,是一个实施赶超战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人口大国疾速奔跑的身影。

我们的确跑得很快。在过去的30余年中,中国GDP增长速度一直名列世界前茅。从2005年到2010年,中国GDP相继超过意大利、英国、德国、日本,跃居世界第二。

还可以通过一些更具体的事件来见证“中国速度”有多快:我们只用了30年的时间,就把深圳从贫穷落后的边陲小镇,打造成一名满全球的国际化大都市;我们只用了20年的时间,就从无到有,建成了世界第二大股票交易市场;10年前,大多数中国老百姓还不知高铁为何物,而今中国在建的高铁干线总长度排名世界第一……我们跑得如此之快,快得连我们自己有时候都觉得不可思议。

长江证券被“秒杀”事件 不宜上纲上线

傅子恒

长江证券9日公布了增发结果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根据总体申购情况,协商确定本次最终发行数量为2亿股,募集资金总量为25.34亿元。

原方案计划增发不超过6亿股,发行新股价格为12.67元/股,筹资规模上限约为76亿元。显然这一筹资规模与原计划相去甚远,仅为预期目标的1/3。长江证券增发事件再一次显示了资本市场波谲云诡的特点。3月3日,就在长江证券增发前一日,收市前最后三分钟中,一笔885万股的买单突然将长江证券股价打到了12元,使得该股股价当日大跌8.47%,收盘价低于增发价的5%以上。有评论戏谑地指出,抛售者在增发前最后的“秒杀”,砸掉了长江证券50亿的增发额。同时,尴尬的还有主承销商,东方证券不得不包销发行总量的55.03%,需拿出近14亿元的现金。这对2010年净利润5.4亿元、所有者权益只有84亿的一个中型券商而言,无疑是一个不小的压力。

是谁推了长江证券的增发局?目前抛售者尚没有浮出水面。有市场评论将此次抛售行为定性为操纵行为,认为监管部门应该介入进行调查

然而,总有一种声音在提醒我们:收收步,放慢一点。这声音,首先起于草莽之间,继而扩散至书斋和学院之中,最终激荡于庙堂之上。于是,就有了不久前温家宝总理和网民在线交流时所作出的“未来五年GDP预期增速下调至7%”的表态,就有了两会委员和代表们的“降增速、调结构、惠民生”的灼灼建言。随着各方观点所形成的交集不断扩大,一个“让人民幸福”的热力词汇宣告诞生,同时问世的还有其孪生兄弟:幸福中国。

是的,疾奔的中国到了该调整其匆匆步履的时候了。因为,30多年的飞速奔跑,固然让我们收获了年均约10%的GDP增长速度,却也让我们派生一系列问题:逼近0.5的基尼系数、5%左右的通货膨胀率、超过15倍的房价收入比和世界排名第一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我们得到的固然十分可喜,我们失去的也相当可惜。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准备将未来5年的GDP增长速度下调至7%,并打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告别GDP崇拜,缔造幸福中国”的旗帜。

我们必须学会运用“减速战术”,而且不能寻找拖延的借口,因为越拖延,由疾奔造成的疾患甚至沉疴就会越多。从现在起,测量我们跑得是否又好又快的尺度,除了GDP之外,还

并处罚。

笔者则认为不尽然。抛却机构之间的利益博弈动机,如果单从股票抛售事件本身来看,抛售者的行为是正常合规的,只是因为长江证券制定的增发价格与市场价格不远,股份的抛售时间与价位较为敏感,并产生了不利于增发的结果罢了。这一事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IPO与增发再融资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定价。

目前无论是IPO还是增发,发行定价一般是由主承销商与上市公司之间协调与博弈进行,二者利益的一致之处在于:上市公司希望更高定价以取得尽可能高的融资金额,而承销商也希望融资金额尽量高,这样便可拿到更多的佣金。因此上市公司与承销商最关注的目标是定价之后的股份能否正常售出。但是高定价首先将考验的就是主承销商的实力,因此在定价与承销能力这二者之间如何进行利益平衡,考验的是双方的技巧,而二者的平衡仍然是价格平衡问题。

总体来看,笔者认为该事件对其他上市公司与主承销商发行新股作出了一个警示,提醒其关注重点应该转移到价格上来。对于“搅局者”来说,利益博弈应该是一件正常的事,只要博弈行为处在正常的游戏规则之内,就无需太多的“上纲上线”。

三大不平衡困扰欧洲经济

陈东海

2010年起,欧盟成为金融危机重灾区,主权债务危机牵扯多国。但除了这一显性问题外,欧元区还有几个重大的不平衡问题,它们可能最终主宰着欧元区的命运。最为人所熟悉的不平衡是统一的货币政策与分散财政政策的平衡问题。这个问题是欧元区的痼疾之一,也是产生欧盟多国主权债务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欧盟在危机以后想尽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进展迟缓、收效甚微。此外,还有两个重大的不平衡,一是各国经济政策不平衡,一个是欧盟内部的贸易不平衡问题。这两个不平衡导致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也是导致欧盟内部问题产生的主要根源之一。

经济政策不平衡,就是欧盟各国通过竞争性政策来展开竞争。在危机前,爱尔兰一直是欧洲经济发展的示范。但爱尔兰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功劳是税率优势导致的。在1990年代,其外

企业所得税率只有10%,内企业所得税率只有12.5%,到2003年统一为12.5%。而欧盟各国平均的公司税率约为35%,德国高达40%。爱尔兰的低税率,提高了其对欧盟其他国家的竞争优势。1994-1997年爱尔兰GDP年均增长7.7%,1998-2000年年均增长10%。

目前,保加利亚和塞浦路斯等国的企业税率仍只有10%。由于欧盟各国的企业税率高低悬殊、实际税率和总体税率也高低不一,所以在欧盟内部已经引起了争议。现在德国等国要求爱尔兰等低税率的国家不再以低公司税率来谋取竞争优势。从2011年2月起,德国和法国联合提出了欧洲的竞争力公约,要求在欧洲统一征收企业税。德国和法国的竞争力公约,将在3月召开的欧盟首脑会议上讨论。但这一提议遭到许多欧盟和欧元区边缘国家的反对。因为那些边缘小国,在强势欧元和财政限制开支的情况下,要想保持竞争力,只能依靠较低的税率来吸引资金。

将有GNH——国民幸福指数。

共识既成,何必犹豫。在“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让我们勇敢而坚定地跨出减速的第一步。要知道,即便是维持7%的GDP增长速度,中国也是在奔跑,这一速度仍然让他国自愧不如,其中包括GDP百年长跑冠军美国,也包括GDP刚刚被中国超越的日本,以及欧洲诸雄;摆脱金融海啸不久的他们,依旧步履蹒跚。这种反差,也在客观上为中国提供了减速小跑、着眼长远的时间窗口。

放慢脚步,我们可以随时欣赏沿途的风景。曾几何时,由于争相生产钢铁和水泥,我们亵渎了蓝天;由于飞速奔跑,固然让我们收获了年均约10%的GDP增长速度,却也让我们派生一系列问题:逼近0.5的基尼系数、5%左右的通货膨胀率、超过15倍的房价收入比和世界排名第一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我们得到的固然十分可喜,我们失去的也相当可惜。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准备将未来5年的GDP增长速度下调至7%,并打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告别GDP崇拜,缔造幸福中国”的旗帜。

放慢脚步,我们可以腾出时间来反思自身的发展路径。消费、投资和出口这“三驾马车”应该如何摆位,才会继续均衡前行而不至于中途翻车;经济发展所创造的成果应该如何分配,才能让国民公平共享而不至于产生民怨;保障房计划应该如何实施,才能

普惠蜗居中的蚁族,让他们拥有灯下读书的尊严和推窗望月的快乐;高企的通货膨胀应该如何降服,才能让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无忧无虑;管得太多,四处救火或者制造麻烦的政府,是否应该回归“守夜人”的角色?这些关于中国未来发展命运的问题,都需要我们认真思索,细致求解。

放慢脚步,我们可以借机借鉴他国的发展得失。深受房地产泡沫破灭之苦,经济十几年来徘徊不前的日本;借助美元全球尊大地位,实施宽松货币政策转嫁金融危机的美;曾经奔跑,最终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各国,这些国家施政的经验教训,是我们应该予以善待和开掘的全球版“资治通鉴”。

放慢脚步,我们从容继续前进的力量。在经济全球化的舞台上,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长跑比赛。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永远在路上。因此,我们不必为自己一时的减速而患得患失。把“中国速度”适当降下来,休养生息,这样我们就避免了涸泽而渔和发展透支,从而能够把更多的青山绿水和矿产资源留给子孙后代。

欲速则不达,能慢才能快。请相信,在主动而理性地减速到7%后,中国不仅可以跑得更快,而且可以跑得更精彩。请相信,在那可以被信念和坚毅共同征服的远方,幸福中国的驿站,正在耐心地等待我们抵达。



企业涉足出租房,市场增加参与方。政府表态送鼓励,企业出手有担当。进入门槛应合适,融资渠道要通畅。住房租赁产业化,此举打响第一枪。

ICLONG/画 孙勇/诗

专家论道 | In-depth Comment |

用工荒就业难并存 折射经济转型困局

刘晓明

曾几何时,人们被过剩劳动力安置搞得焦头烂额。如今,2004年发端于东南沿海的“用工荒”正以急速向全国各地扩展。3月8日,人保部部长尹蔚民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用工荒正在向中西部地区蔓延,同时今年城镇大概需安置劳动力为2400万,其中青年学生加起来近1400万,同时农村依然存在还需继续转移的大约800万左右富余劳动力,劳动力市场总体呈供大于求格局。

中国有8亿左右的劳动力总量,因此不能仅凭人保部提供的3000万待就业人群就断言中国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殊不知,如此庞大的就业基数,区区3000万待就业人群可作为充分就业下摩擦性、结构性失业的正常状态,而非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之理据。而且当前席卷全国的用工荒强有力地反证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说难以成立。

纵观工业革命后世界各国就业情况,出现真正用工荒等问题的时期主要集中于美洲大陆。15-16世纪新航路的开发和新大陆的发现,导致美国出现劳动力不足问题,且美国的用工荒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至少1860年代的美国南北战争后,美国还未能有效改善劳动力紧张问题,典型的例证就是当时南方奴隶主新开高工资网罗获得人身自由的黑奴,但在自由与经济激励面前,美国黑人选择了自由而拒绝了高工资的诱惑。此外,两次世界大战也造成战后较长时间的用工荒。

显然,当前中国既无战争所带来的非正常人口伤亡,也无1960年代大饥荒期间那样的人口折损,中国未出现典型的人口断层现象。因此,借助刘易斯拐点来解析当前中国用工荒现象,并不足取。

其实,不论是当前用工荒问题,还是30年来劳动力供过于求,在理论上都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即经济增长源自资本积累和要素投入。这是至今经济学家依旧争论但却越来越明化的经济增长秘密命题。自索洛修正了其经济增长模型,以索洛剩余来引发经济学界对经济增长秘密之新思考后,当前经济学界不论何种流派,都认同了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主要作用。因此,若基于新经济增长理论,原来所谓的中国廉价劳动力优势和当前用工荒都是只不过是劳资利益博弈的问题。

具体而言,若制度环境更有助于提高资方在博弈中的地位,那么资方可以获取TFP增长所带来的大部分甚至全部经济增长收益,直接影响到劳动力市场的边际工资,使劳动力市场的边际工资偏离实际均衡值。改革开放30年来,资方利用其在分配制度等方面的有利地位和获取信息优势,稳固地保持了劳动力价格长期偏离实际均衡值,直到近年来随着知识结构、个人诉求等优于前辈的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主流,劳动力价格长期偏离均衡值的问题才得以缓解和改善。

同样,若制度环境有利于劳动力在博弈中的地位,那么工人就可获取TFP增长所带来的大部

分甚至全部经济增长收益,甚至可以使资方投资收益偏离实际均衡值。当前欧盟和美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一问题。如美国三大汽车生产商就一度受制于庞大的工会压力而陷入困境,导致除福特之外的两家汽车商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损失惨重。同样,欧盟法律赋予工会较大的权利,严格要求企业不能随便解雇雇员,导致欧盟的企业长期以来面临较重的劳动力成本压力。希腊等“欧猪五国”的债务危机、日益扭曲的经济产业结构以及私人部门活力的长期低迷,都客观上佐证了强化工会权力的制度安排给整个经济带来的系统性损益。

毋庸讳言,正是中国长期以来在分配制度、劳动力市场制度等经济制度层面偏向于资方,导致了中国经济内外失衡、内需承载力有限等问题。希腊等“欧猪五国”的债务危机、日益扭曲的经济产业结构以及私人部门活力的长期低迷,都客观上佐证了强化工会权力的制度安排给整个经济带来的系统性损益。毋庸讳言,正是中国长期以来在分配制度、劳动力市场制度等经济制度层面偏向于资方,导致了中国经济内外失衡、内需承载力有限等问题。希腊等“欧猪五国”的债务危机、日益扭曲的经济产业结构以及私人部门活力的长期低迷,都客观上佐证了强化工会权力的制度安排给整个经济带来的系统性损益。

由此可见,除非一国劳动力市场出现显著的非正常折损,否则一个经济系统能容纳多少劳动力和人口,是一个无需争辩的自然状态,不存在各个行业劳动力供大于求或供不应求等问题。

为何改革开放初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我们认为,一则源自长期以来农业处于哺育工业的不利的政策与制度格局,使农业劳动力回报低下,存在转移动机;一则工业承接了国际技术外溢,迅速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在当时加工制造业等贸易部门为农村劳动力提供比务农更大收益。然而这种过度的转移使农村自1990年代末期就出现了农村劳动力匮乏,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主要为老人幼童等问题。这充分显示1990年代学界倡导的廉价劳动力实际上是贸易部门对农业资源的抽离。

因此,改革开放以来的廉价劳动力潮涌并非市场状态下的劳动力过剩,而是政策性、制度性所带来的劳动力非市场化造成的结果。同样,当前用工荒,本质上是劳动力市场对长期以来劳动力价格偏离均衡值的自发修正,即劳动力通过用脚投票来表达其利益诉求。这是新生代农民工知识结构提高、识别能力增强背景下,对劳动力市场价格进行重新博弈的可喜且理性过程。至于当前失业集中于大学生,农民工反而稀缺,显然与近年来大学扩招造成的劳动力就业结构、工种结构的扭曲有关。因此,当前大学生就业难反映出的问题不是劳动力的供大于求,而是中国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所面临的转型困局。

联系我们

本版文章如无特别申明,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也不代表作者供职机构的观点。如果您想发表评论,请打电话0755-83501640;发电邮至ppl18@126.com。

在3月的若干次欧盟高峰会议上,各国首脑将会讨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从表象上看,它体现为各国GDP增速不一样,而表象后面是货币体制和财政体制的不平衡,各国经济发展的政策不平衡和内部贸易不平衡。如果不能充分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那么不平衡的局面会持续甚至恶化,欧洲的问题也难以得到彻底解决。笔者认为,欧盟在欧元区的体制下,很难真正解决这三大不平衡问题。(作者单位:东航国际金融公司)